

吴直雄◎著

玉屏东灶用尖故糖粹

 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妙用典故精粹

吳直雄◎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编委会

主任：黄书元 段桂鉴
副主任：任超 平人
总指导：董伊薇 刘林娣 梁福明
总策划：向军 赵军 赫崇华 冯成平
主编：吴直雄
副主编：张振明 熊良钟 夏熹
执行主编：贾东丽 陈玉婷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龙	王占一	王化	云霞	邓本政
田天柏	田丽娟	卢龙芳	卢光辉	冯北平
安妍	齐嘉	师延彬	李全利	李爽
李春生	李淑华	李媛媛	杨艾元	杨洪峰
何凤飞	张莉	张娟	张晓栋	陈再明
陈静	胡桂梅	罗爱华	罗丽娜	罗俊锋
陆宁	周晓矛	岳云镐	郑辉印	柯尊全
荣滕娟	贺畅	贺岁华	侯振华	袁莉
秦嘉	秦梓诠	葛君妍	高淑娟	程冠军
徐春新	翟梦妹	谭洋安		

作者简介

吴直雄，江西萍乡市人，历经学生、农民、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等。1968年大学毕业后至中国人民解放军0484部队锻炼并分配在地专机关从事文教、知青、办公室等多项工作。学习与工作之余，为部队、工厂、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绘制毛泽东巨幅画像及针灸穴位图谱数百幅，书写楹联数百幅。10年后调入江西大学（今之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任文学、历史学责任编辑，研究员。现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名人研究会副会长、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嘉应学院客座教授、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自1978年以来，审编并出版文稿、书稿等1500余万字；在国家级、省级等刊物上发表文学、史学、编辑学等论文200余篇；出版《毛泽东楹联艺术鉴赏》《毛泽东妙用诗词》《楹联巨匠毛泽东》《实用标点符号手册》《中国谜语概论》《古今诗谜百首欣赏》等著作12部，总论著字数600余万；发表楹联作品数十幅，创作并书写的楹联书法作品为有关书刊发表和有关纪念馆收藏；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图书奖、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和江西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等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奖励，含一、二、三等奖40余个。于1992年以后先后破格为副研究员、研究员。《世界名人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模大辞典》《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中国诗词作家辞典》等数十种辞书中有传。

出版说明

中华文明五千年，典籍如海穷无边。这数不清、理不尽的典籍，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知识巨川，铸就了中国这一举世无双的典故大国，展示了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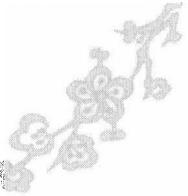
中国典故，是中国语言的璀璨瑰丽之珠，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涵蕴丰富、信息光彩耀眼、具有极强美学价值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人们通过对典故的妙用，能使作品流光溢彩，用典是中华文化最高水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故而，在中国，用典高手如林，诸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然而，毛泽东用典有古今用典高手无法企及的特点与理论，这就是：诗文用典挥笔神，下笔言语妙天下；数量质量冠古今，思深意远博众长；蕴涵深刻为现实，用典之作意境新；“垂范”后世树榜样，千古传流永菲芳。

然而，毛泽东与中国典故的关系如何？毛泽东怎样妙用典故？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中计用了多少典故？经毛泽东所妙用的典故，与其时及今后的人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如此等等，虽然不少专家学者都称赞毛泽东运用典故绝妙，甚至连外国学者也赞不绝口，然至今无人就毛泽东妙用典故作出系统而专门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以A、B、C三卷，拟对于上述问题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探讨。

A卷《运用典故数千年 聚讼纷纭解奥玄——中国典故研究（主要以毛泽东妙用典故为例）概说》。首次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索了中国典故之定义、典故之分类、典故之形成、用典之手法、用典之特色、典故与文本之阐释关系问题、典故之解读问题、典故之古今状况、典故与成语俗语歇后语等等之关系、典故之原义与其派生义、用典与接受、用典与“抄袭”“剽窃”乃至是否要用典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对于毛泽东用典之缘由、基本内容、基本形式、基本手法、思想风格与艺术特色进行了研究，并就建立毛泽东典故学和中国典故学，提出了较深层次的思考，给人们以较深的启迪。

B卷《诗坛联坛如椽笔 千载用典数第一——毛泽诗词、楹联用典探妙概说》。就毛泽东用了典故的87首诗词、68副楹联的用典缘起、典故内容、用典探妙分别进行了系统品评、鉴赏与探讨。从妙用典故的角度，揭示了毛泽东的诗词、楹联为什么能够风靡当世而久盛不衰的重要缘由之所在。

C卷《聚玉缀英成文妙 精彩精深典意浓——毛泽东在其论著中用典探妙概说》。分别就《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的近三百篇用典文章，就其用典缘起、典故内容、用典探妙进行论说，以期对毛泽东用典精妙之所在，予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

以全面的揭示与评析，从用典的角度展现毛泽东文章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展现毛泽东所妙用典故的重要教育意义与其擅长用典之密切关系。

吴直雄研究员以其勤奋治学的精神与坚持不懈的毅力，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诗文书法由来已久。其《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自列入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之后，他便夜以继日地奋笔三年，以数十万字论文结题；然他一鼓作气、马不停蹄，排除困难与干扰，得以完成这部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毛泽东妙用典故的学术性、实用性具兼的著作。这是他继《毛泽东妙用诗词》（上下册，92万字）《楹联巨匠毛泽东》（80万字）之后的又一部两百余万字的力作。

妙典令人赏不厌，雄文长留天地间。书稿的生命力源于读者的充分接受和尽情分享。本书是著者拟将其作为“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或是“毛泽东典故学”抑或是“毛泽东经典诗文典故鉴赏辞典”，向广大读者献上的一份薄礼。从本书的索引来看，它又是一本以毛泽东所妙用的典故为基础、别具特色的“典故、典例、名言、格言、箴言、名诗、名联、警句、佳句、秀句、隽语大辞典”。其学术价值、阅读功能、收藏意义、实用效果如何，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序一

用典妙笔铸精品 资政育人好教材

——吴直雄《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

吴 正 裕

毛泽东在论及中国近代史时，曾以其动情而极富深意的笔调揭示道：“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下册，第8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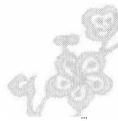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余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是一个以爱好和平但又不畏强暴著称的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逝世的13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甘使美丽的国土沦为殖民地、不甘做屈辱的奴隶而奋起的反抗史，是一部为了推翻腐败社会制度、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状况而经受着血与火的战争洗礼的奋斗史，是一部最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完成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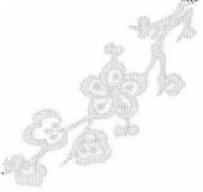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集》等，这是毛泽东的最为基本的著作，是经过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的诸多专家、学者之手而认真编辑出版的。这些著作，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擎起先烈们救国救民的大旗，带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排除万难朝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真实历史记录。这些著作，承传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把握着时代的脉搏，纳百年风云于笔底，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奋斗中的最为动人的展现，是激励爱国情操、铸就中华民族之魂的经典，是历史伟人毛泽东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这，无疑是资政育人的最好教材。

伟人虽已逝，诗文永传世。毛泽东的这些著作，作为资政育人的好教材，其深刻的内容有一大特色，就是他借助妙用典故予以生动形象而富于魅力的表述，有一

1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





语天然万古新之妙。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说：“就现代汉语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书面语言，无疑是毛泽东著作的语言。”

（邢福义主编：《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就毛泽东著作语言中的使事用典而言，毛泽东以其下笔用语之神，以其“雄视万代驾驭古今之妙，既继承前人爱用典、擅长用典的传统，又在前人用典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使古典文学在其著作中获得了崭新的活力与新的生命，引领人们走入一座中华文化艺术瑰宝的殿堂，激活了典故中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永远不灭，自强不息的精魂，这是前无古人而又能后启来者的。”（吴直雄：《关于建立毛泽东典故学的思考》，《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早在1988年元旦之后，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士，云集于巴黎发表了一份庄严的宣言。宣言说：“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陈玉书：《百年香港与中华文化》，《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30日第3版）“孔子的智慧”，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的骄傲与荣光。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类的优秀儿女，以他们杰出的头脑，洞见孔子智慧的精华所在，乃在情理之中，他们对中华文化有其高度的评价、向往和追求亦是理所当然。孔子智慧诚然堪夸，然而它较之于中国典籍文化的智慧，孔子智慧只算是其中闪光耀眼的一珠而已。

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是诗的国度，而且是世界上典故无与伦比的大国。放眼中国之典故，当以恒河沙计。这些难以计数的典例故实，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璀璨结晶，是中华最高水准文化的具体展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运用的这些中国典籍智慧，决不是书斋式的。他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页）。他又说：“求新并非弃旧，要吸取旧事物中经过考验的积极的东西。”（〔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周爱琦译，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毛泽东运用典籍、典故之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就连外国学者也不禁感慨与叹服。这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他（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美〕施拉姆：《毛泽东传》，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毛泽东所妙用的这些典故，涉及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等诸种智慧的方方面面。他借助这些典故的运用，或是高扬爱国主义的情操，或是展现自强不息的志气，或是承传中华传统的美德，或是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以科

学的诠释…… 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评说，更是他擅长调动与激发典故中的这些智慧，以增强诗文的政治与艺术感染力的绝妙手法。妙用这种重要而特殊的“语料”，是言之明白易懂、论之深厚有物、道之妙趣无穷的“再度创作”，是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精神凝聚，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复兴旋律，是借古砺今、厚古薄今、古为今用的绝唱，是从不同角度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灿烂文化在血与火的历练中对民族精魂与民族丰碑的铸就。

吴直雄研究员历经数载不懈的努力，终于撰成了这部两百余万言的《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他从毛泽东妙用典故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永远闪光、魅力无穷之所在，并精彩阐释了毛泽东诗文最为集中地凝聚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我们的民族魂，正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勇敢无畏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妙合。毛泽东不愧为让中华民族智慧巧妙铸入现代人心灵的一代高手。读一读毛泽东所妙用典故的这些精美语言，领悟毛泽东所妙用典故的真谛所在，确能启人心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一书，同样不失为资政育人的辅助性好教材。

吴直雄研究员与我相交多年，深知他潜心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诗词和楹联等造诣精深，著述颇丰，曾拜读过他的大作。这部《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是他呕心沥血的力作，特向读者郑重推荐。是为序。

2005年9月26日 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序二

学术实用同相济 一书在手好处多

——吴直雄《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

周 声 柱

吴直雄研究员的又一宏论崇著——《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就要公开面世，可喜可贺！

中国典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它蕴含着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浓浓郁香、哲理深邃的民族色彩。故而可以说，中国典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信息块”与“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如果这仅仅是从典故的本身而言的话，那么如何用典，如何去激活这些语言的“活化石”，如何发挥这些“信息块”“活化石”的作用，则是个人智慧的绝妙展现。

吴直雄研究员的《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一书，以两百余万言的篇幅，首先在中国典故的历史、定义、特色、用法、深层意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地精心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集》等中的用典语料为主要素材，揭示了作为一位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书法家、文章家、大诗人、语言学家、用典艺术大师毛泽东妙用典故的大智慧，展现了毛泽东使事用典所达到的登峰造极地步。读罢是书，真正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妙用典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人惊叹！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是笔者目前所仅见的一部最具特色、且是经一人之手、选毛泽东一人所用之典而完成的大型理论学术与实用相济的典故巨著，其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更属笔者所见相关著作中的首屈一指之作。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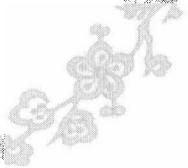
一是本书从典故理论溯源追流入手，广涉典故和使事用典的各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着作者言之成理的诸多独特见解。如从典故学的角度出发，连类而及，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接受美学中的诸多理论中国早于西方，集大成者当为毛泽东；又如从典故所处的层面，提出了“大”典故与“小”典故、相对性典故与绝对性典故的概念。这一观点与概念的提出及其言之有理的论述，大大地有利于我们对于涉典诗文理解的反思与欣赏。与此同时，论及毛泽东用典的各个层

面，可谓相辅相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也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毛泽东典故学”，也可以说是一部主要以毛泽东一个人用典为例的“中国典故学”。

二是本书从毛泽东的上述5部大著中的443篇用典诗文书信中，探索出毛泽东的3474余处所用之典的典故辞条，直雄同志并以约9948条典源、典例相辅而略诠释之。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又是一部围绕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而取典的、富于特定意义的“中国实用典故辞典”或曰“毛泽东经典诗文用典示范大辞典”，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殊的高品位的载体，它有如一部智慧人生的经典格言。是书在手，可以说是我们找到了学好文言的一个最佳的工具。

三是本书以A、B、C三卷为总纲，以精妙的7字联语式句子总括该卷的主旨，以副题展示所要探讨的该卷主要内容，接着予以简要的概论式论说该卷所探用典之精髓所在，给人以总览会意之妙。然后又以上述同样的形式，将所要研讨的各卷的内容及其所要研讨的中国典故理论和毛泽东的用典概况简要地概括之，同样给人以分览会意之妙。继而又就毛泽东的443篇用典诗文，以大致相对的7字句为主标题，于诗文的主标题之后配之以相关文字作为副标题，凸显了该诗文或书信的内容。这真可谓是：主题副题两行字，引领读者识真谛。紧接着在主标题之下标“用典缘起”，以极为简练的文字勾勒出所要探讨的毛泽东该作（或是诗、或是文、或是书信、或是报道、或是改作……）的写作背景。尔后，又标“典故内容”，找出该诗文所有的典故及其该典故的典“源”与“流”之典例，让人一望便能将该诗文所用之典故及该典的“源”“流”“典例”了然于胸。最后，再标“用典探妙”，揭示毛泽东在此诗文中的主要的用典之法、用典的多层内蕴之所在，进而从用典的角度，展现毛泽东用典之妙。这又是《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一书在写作与编排上的一大特色。

四是本书在每篇的探妙诗文所标的“典故内容”中，作者鉴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的用典，多是用“聚锦参合选优法”，故须找出毛泽东所用该典故的“源”与“流”，这将会大大地有利于人们对于毛泽东所用该典的理解与品味。同时也考虑到这也是一种学术积累、是学术价值根基之所在，毋庸置疑，这是大大地有利于广大读者的。为此，作者在所标的“典故内容”一节中，将毛泽东所用的每一个典故，都尽其之可能，找出毛泽东所用该典故之“源”与“流”以及该典故“变相”后的“典形”（作者有时称其为“母子典”），这些“源”或“流”或“典形”及其各自所用之典例，均嵌藏于相当多的经典著作的典例之中，作者将其标引出来，构成这部学术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再是作者在“用典探妙”一节中，也运用了相当多的典故语言和其他格言、秀句、名言、箴



言、名诗、隽语，以论证毛泽东在该诗文中的用典之妙。在上述这些方面，作者是下过不少功夫的。这也是对典故的多角度、深层次的探索与开掘，也是这部《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与其他典故类著作相比时的特色独显之处。

五是鉴于上述两种情况，自然而然地使本书中出现了与其他一般书籍所不可能具备的、数量竟达14000之多的典故、典例、名言、格言、箴言、名诗、名联、警句、佳句、秀句、隽语……文章不易写，名句更难求。名言、名句、名典，是经过历朝历代名人大手笔精心锤炼、长期传扬、不断增值下来的学术成果和文化成果的积累，是无价之宝，是金玉之闪光，是智慧之源泉，是宝贵之财富。本书可谓荟萃了典故名言之精华，填补了典故研究史上之空白。本书作者看准了此书的这一特点所构成的优势，于是在本书的结尾将其以“笔画索引”表现之，这就使本书具有“典故、典例、名言、格言、箴言、名诗、名联、警句、佳句、秀句、隽语大辞典”的特质。

六是本书充分地考虑到读者们的“时间如金”及对本书的阅读与使用实际，为了让该书的这些特色方便读者以充分的利用和把握，在编排上作出了与其他书稿不同的大胆尝试。这就是以“目录概要”为“总目”（或曰“简目”），让读者一览“总目”，即可把握全书的主要内容之所在。以“目录细编”为“分目”，让读者一览“分目”，即可从速地“扫描”所要阅览的篇、章、节乃至某一具体之典故的具体运用情况，让人历历在目，可达按“目”索骥之效。这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就是没有专门时间读完这部两百余万言的著作，也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书在案头，待要细读或是查询某一典故的内容或是其运用的具体情况时，翻“目”即见，这实在是便捷的事。从这一角度上来看，是书又可称得上是一部“毛泽东经典诗文妙用典故精粹鉴赏辞典”。

水滴积多可成海，胸罗典故学问深。丰富多彩的中国典故，折射出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初读是书，有如步入一座珍藏艺术瑰宝的殿堂，让人领悟到了毛泽东著作中所凝聚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之所在，激活着我们的思维，加深着我们对于毛泽东诗文真谛深层次的理解。深感其“学术实用同相济，一书在手好处多”。我相信，《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这一雅俗共赏的巨制，将从大学生到小学生，从机关干部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以及社会上所有的读者们陶冶性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从事写作、加强修养、丰富思想、升华精神的良师益友与案头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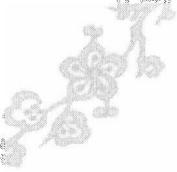
我与直雄同志相见相识于30年前他积极参与创建中共江西省党史学会之时，熟悉了解于他常求教于谷霁光教授（时我为谷老校长助手）之日，相处共事于本人到任于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之所。

直雄同志工作经历十分丰富，当过农民、工人、教师。他大学毕业后，进入部队大学生连锻炼，尔后即从事地专机关的教育、知青、党的中心工作等达10年之久，在工作中已是独显其才华。1978年调入江西大学（今合并为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正置年轻有为的他，朝气蓬勃地接手编辑部的文、理科学报的编务、编辑工作和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凭着他的能力，皆圆满地独自完成这些工作任务。至1985年，新陈代谢、“老将”们先后退离，直雄同志则勇挑文学、历史学责任编辑的重担。在工作中总是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到极致。在责编文、史文稿的同时，夜以继日地挤时间就中共党史、中国民间文学、编辑学、中国诗联学等着手研究。并不时涌动才思、触发灵感、笔不辍停。先后在《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民间文学论坛》《中国出版》《语文建设》等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各类文论200余篇，在国家级、省级出版社出版专著12部。总计出版论著字数600余万，同时任南昌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2003、2004、2005级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这对于已责编出版文史文稿约达1500万字研究员来说，可谓硕果累累，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连续进入“中文核心期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一个何等巨额的工作量啊！然远不止于此：据笔者所知，直雄同志在毛泽东诗文研究上，尚有250万字的论著正在逐步地完成中，在中国诗文研究上，亦有近200万字的论著待写，在中国小说研究上，一部近100万字的论著亦在其奋斗日程中“排队”。这也许正是直雄同志惜时如金的原因之所在。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也同时属于世界。我国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张静如教授说：“研究毛泽东，国人之任。利国利民，意义重大。”（张静如：《毛泽东研究全书·序》，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出版之际，直雄同志诚邀我为之作序，虽勉为其难，仍不揣浅陋，乐而为之，特写了如上文字。愿直雄同志关注健康，战胜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再接再厉、捷报频传。直雄同志的系列新著，本人翘首以盼！

2008年10月1日 于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



自序

石韞美玉而山晖 水怀明珠川自媚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

吴直雄

大名人胡适曾提出过有名的“八不主义”（即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八条建议），其中的“一不”，就是“不用典”。尽管在不同声音的反驳下，他也曾作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解说，但毕竟因其名气太大，此论还是颇具影响。

笔者以为，这对处于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国人来说，要在行文和讲话中不用到典故，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有如一个人，要用自己的双手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面一样之不可能！就说胡适所提出不用典的名篇《文学改良刍议》吧，这篇文章仅六个字的题目，其中就有两个字属于用典。且看史式先生那击中要害的分析：“夫刍议者，刍菑之议也。何谓‘刍菑’？刍者割草，菑者砍柴，割草砍柴，意谓樵夫。刍菑之议，就是来自草野的意见，是乃假客气的自谦之词也。《诗》曰：‘询于刍菑’。唐张说文曰：‘臣自度刍议，十不一从’。胡适坚决反对文言，反对用典，则此‘刍议’，文言耶？是典耶？真是地道的自相矛盾。”（史式：《汉语成语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113页）

据笔者所考，我国自有诗文以来，人们便将大量的典故夹杂其中。不少的文人学者，在他们的诗文论著中，都恰如其分地运用典故，使他们的著作熠熠生辉，有的还永为后世所传颂。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本书在后面将会广为涉及，此不一一举例）。

宋时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黄山谷在其《答洪驹父书》中有云：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山谷的“无一字无来处”以及其“点铁成金”之语，揭示了用典与撰写妙文之间的真谛之所在，揭示了名人名言名篇佳什之传播特点之所在，遂成千古名言。

清人袁枚则有其用典心得。他说：“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随园诗话》卷1）“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同上书卷10）“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小仓山房诗文集》）此乃用典之高论。因为他揭示了用典之必须、用典的根本之法的用典该达到的效应。

为什么会出现人们非要用典这样一种现象呢？笔者以为：这就是因为典故是一种文化精萃的积累所致。

就世界范围而言，世界各国学者对于典故均十分重视，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我国著名学者蒋孔阳教授是把典故视为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他十分透彻地剖析道：

……典故是各民族语言宝库的珍品、文化积累的精萃。从中可以领略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民族的历史与传说、各国人民的智慧与幽默。它们又是各具风采的民俗博物馆，从中可以看到各民族一张张富有个性的脸。从修辞学角度讲，各国成语典故不仅有其共性：形象、简炼、寓意深刻、机智幽默，而且有其各各不同的个性。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构词成句，赋予语言以精辟的哲理与审美的感受。（王国荣、吴克礼、张坚、郭志坤、童威主编：《世界成语典故辞典》[序言]，文汇出版社1989年版）

就我国的客观历史实际而言，陈元晖先生称：

古典文学包括古代成语、典故、隽语、俗语等等，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喜爱，特别是在青年人以及国外汉学研究者中，日益表现出特殊的浓厚兴趣。为此，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致力其业。……我国古代成语典故、隽语名言、俚俗格谚，浩如烟海，散见于大量书面语言之中。这些古籍，仅以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而论，据统计有63853种之多，有的说还不只此数。（章俗、谷超编撰，陈元晖、苏蓟审校：《成语典故源流故事赏析辞书》[序言]，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由此可见，典故，实际上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典籍中的闪光部分。如何对待这些文化遗产？亦即是如何对待典故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是有其精辟论述的，这些论述，毋庸置疑，也当是教导我们如何运用典故的指导性原则。毛泽东挥动其哲理之笔十分辩证地写道：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俗话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里，毛泽东着重地谈到了批判地继承文



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而典故，正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我以为，上述这一论述，理所当然地适应我们如何对待典故这一问题。

中国的典故，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去批判地继承这一文学艺术遗产呢？继承批判这一文学艺术遗产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毛泽东是将这样一个问题与中国革命联系一起进行阐述的。毛泽东紧扣当时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分析道：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在论及典籍与新文化密切的继承关系时，毛泽东以其富于哲理的辩证之笔揭示道：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在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在具体地对待中国典故这一个问题上，毛泽东还谆谆教导我们说：

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7—838页）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将典故与语汇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去看待，足见他是何等注重对于典故的发拙、学习、继承和运用！

毛泽东在否定“国粹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论等一些不正确的论调的同时，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作为我们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明确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亦是我们如何对待中国典故和如何运用中国典故时所必须遵循的最为基本的准则。

在如何使用祖国的语言上，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尤其是在如何运用中国的典故方面，毛泽东是为典范。

早在1912年，因毛泽东酷爱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从而引起了同样酷爱历史和文学的国文教师胡汝霖先生的高度注意。这位胡先生是前清甲午恩科进士，曾当过候补道台及10多年的知县，这10多年的知县，使他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辛亥革命风云起，他曾积极响应。这位胡先生学问高深，其文章的名气很大，用典十分高明。毛泽东很喜欢和尊崇胡先生诙谐、信手拈来就能活用典故的本领。胡先生的活用典故，给了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与熏陶。（参见杨庆旺：《毛泽东和他的平民朋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由于毛泽东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厚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的功底，更由于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运用典故方面，同样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这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尤其表现在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的的阐述与运用上，这正如石仲泉所言：

用中国古诗、典故、成语、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仅使抽象的哲学观点通俗化，而且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毛泽东发挥了这个特色，大量列举中国事例，用适合中国人民习惯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提供了经验。（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平生读书破万卷，行文用典如有神。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其《学习毛泽东——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节录》一文中由衷地赞叹道：